

从国情出发，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媒体认识的变迁

信息传递 观念传播

媒介监测 娱乐功能

农村传播学 研究方法初探

方晓红 等/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信息传递 观念传播
媒介监测 娱乐功能

农村传播学 研究方法初探

方晓红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 /方晓红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01 - 006888 - 6

I. 农… II. 方… III. 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
IV. F32-05; D422. 6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112 号

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

NONGCUN CHUANBOXUE YANJIUFANGFA CHUTAN

方晓红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25

字数: 2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06888 - 6 定价: 23. 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本专著是2003年申请并获批准的“传播媒介对‘三农’的作用及指标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中国近十年来，定量研究多了起来。新闻传播学界出现了众多的媒介调查、受众调查研究。由于这些研究根据不同的需要开展，因此问卷的内容有较大差异，其调查结果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说，都很少有可比性，因此，科研成果的重复使用率太低。

同时，由于上述研究往往是根据一个单一目的进行的，因此，其问卷所得的数据只有在当时的分析中起作用，而在另一个科研环境中，就未必是客观的、公正的。

此外，在面对实践媒介问题时，单一媒介指标往往很难解决一些系列的问题。而媒介指标体系则可为媒介调查编织一张“网”，揭示媒介发展的纵向与横向关联，从而得出相对准确的研究结论，为媒介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要解决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媒介对农作用调查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相对科学地测量媒介对“三农”作用的依据，是了解我国媒介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效果评价的一个衡量标尺，也将是实现媒介效用最大化的动力。

本课题的申报正基于上述原因。

课题的研究路径为：综合西方传播学理论中的“媒介功能”

学说，以中国国情为立足点，考察新中国建立以来，各个不同阶段中，对于媒介功能的认识变迁，研究媒介在“农村、农民、农业”发展中究竟而且应当发挥哪些效用。这一研究路径的确立，也为我们提供了测量的维度，为此，我们大致将其分为四个方面：信息传递、观念传播、媒介监测、娱乐功能。

我们的读者可以从指标体系中看到这一思路，但显然，指标体系的测量维度并未完全局限于此。

整个研究过程由以下几个阶段构成：

一、资料收集、整理。这一阶段，我的研究生董晓婷、贾冰、周伟、张晓坚、余昌伟、李浩崴，利用寒假的时间，协助我做了大量的文本分析，累计收集、整理了18450篇新闻报道，为我们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数据。

二、资料分析及指标拟定。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研究资料，展开文本分析，在“媒介功能”的牵引下，初步拟定了媒介于“三农”作用的若干指标，并召开了若干次小型意见咨询会，咨询若干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专家，请教他们对指标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以此为基础，初步设立了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抽样调研阶段（2004.6—2004.12）。在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初步设立的基础上，开始抽样调研。首先在江苏省的射阳地区试投放《媒介对“三农”作用调查问卷》，根据问卷回收结果以及与当地农民的座谈反馈，课题组又对问卷内容做了进一步调整，此后，按原定计划在长江沿线的四川（负责人陈莉）、湖北（负责人曹刚）、江苏（负责人方晓红）三个省份的农村地区发放问卷。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对指标体系进行修订。

就此初稿再次征求多位国内专家的意见，最终确立专著中提供的“4+1+1”指标体系。

本成果构建的“4+1+1”指标体系，共分为两大部分。前

者（“4”）以媒介功能为框架，分别考察媒介在行使其信息传递、观念传播、媒介监测、娱乐功能时的报道水平。即“X媒介信息传递水平”、“G媒介观念传播水平”、“J媒介监测水平”、“Y媒介娱乐功能水平”四大体系。

后者（“1+1”）是以“三农”所涵盖的范畴为架构维度构建的两部分指标体系，即“媒介对新农村建设的报道水平”、“农民形象报道的失真度测量”。

每个指标体系均设有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两大部分，下分若干层次，每一层次相对独立，可以单独计算与使用。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取用其中的任意一套、任意一个层次的体系使用。这种可分可合的体系，最大的便利在于：它使得许多本来缺少可比性的媒介能够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从而赋予了媒介调查相应的可比性与延续性。

目前，我国传播学界主要引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模型解释中国问题，从对先进学科成果的引进来说，这些都是必然的过程。但是，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创立和研究方法的突破，最终离不开对本国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及理论提升。本课题以媒介对“三农”作用为切入点，在借鉴西方传播学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问题，尝试着在指标体系中设立了“悖指数”及“拟合指数”两项模型，并对这两项模型给予了理论支撑。

“悖指数”、“拟合指数”这一对模型，为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指标。这一对指标旨在从正反两个方向对媒介的功用进行检测。“悖指数”检测的是某类重要信息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传递后，是否出现了与社会真实相悖之处，它的检测方式是“证伪”；“拟合指数”检测的是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对这些信息的关注与重视程度，现实状态及现实中应当有的状态的拟合程度，它的检测方式是“证明”。通过上述一正一反的两个指标，我们可以求证

媒介拟态环境的有效性及偏向性。同时，本体系中还推导了“受众阈值”模型，该指标的创新处在于，强调了受众期待值与满意度的关系。模型的建立，可以为从事新闻传播研究中非涉农研究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测量方式及研究途径。

本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首吃螃蟹者，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就难免存在着遗憾与不足：首先，本成果虽然构建了媒介对农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大体框架，但其中部分指标的设立与赋值还有待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完善，有待媒体业界、后来研究者的检验与补充；其次，本研究中提出的“受众阈值”模型，还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从理论及使用方面，进一步强化其科学性，验证其普适性；第三，本成果囿于时间、精力所限，所选择的文本对象相对集中，假以时日，则当考虑扩大研究对象，以期更准确地测评指标体系的测量方式。

由于本课题所涉及的面广量大，因此，主持人除确立大纲、筹划全书体例，并撰写全书的重要部分外，其余部分交由课题组的其他成员和主持人的研究生，他们分头执笔第一稿，主持人则完成第二稿、统稿并定稿的工作。

撰稿分工如下：

第一稿撰稿人：

导论、第一章：庄曦；第二、三章：方晓红；第四、五章：曹刚；第六章：周伟；第七章：董晓婷；第八、九章：贾冰；附录一、二、三：薛涛。

第二稿撰稿及定稿：方晓红。

本书稿名《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书名中用了“农村”而未沿用原课题中“三农”这一概念。

“三农”，即农村、农民、农业的简称，它是中国的一个特定用语。这一特定用语的出现，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本思想以及对农村的全方位的关注与重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专著所用的“农村”概念并非仅指“三农”中的“一农”，而是一个泛称，它是与“三农”等义的。运用“农村”这一概念，主要是从学术上的角度考虑，也是从与国际交流这一视野中的考虑。是以说明。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专著分量很轻，但专著后面即课题研究中所容纳的心血却不仅仅是这一分量所能承载的。本课题及本专著的完成，得益于众多专家、同行、朋友的鼓励，得益于参与者的相互支撑。它的完成，不仅是主持人一个课题的结束，也是主持人及主持人所在学院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开始。为此，主持人心生感慨与感激，由于感慨良多，感谢者甚众，故而将其置于后记中完成。

方晓红

序 言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并不很厚，但其分量是沉甸甸的。它是当前我国传媒与“三农”发展这一研究领域里最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对于我国农村传播学的研究将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意义。

我对这本书的问世格外关注。

2002年金秋10月，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召开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农村社会发展”全国高级学术研讨会上，我放弃对本人论文的宣读，只是提出“把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建成我国农村传播的研究基地”的建议，并以此为题，谈论其必要性、可行性、有利条件和若干建议，用完了自己可以发言的15分钟。发言之后，吴文虎教授对我说，你给他们出了个金点子。其实并不是我给他们出了好点子，而是他们在2000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农村受众调查，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才有这次专题研讨会，并准备在这个方向上大有作为。我只是为他们造造声势而已。

但我在这样的会议上推动农村传播研究基地的建立却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对农村传播可以说有一种特别看重的心结。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开始三十年来，是跟着发达国家的路子走的，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传播。而我国是拥有世界最多农业人口的大国，农村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学界对农村传播研究关注很少。作为农民的后代，

我历来对建国后长期实行的城市二元化发展模式颇有异议。我们的传播学研究总不能再搞这种二元模式吧。传播学界可以锦上添花，继续做好城市传播的研究；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为农村传播研究倾注心力。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很需要进行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只有加强农村传播的研究，发展传播学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其次，我国传播学研究，大量学人长期以来把精力花在议题大多重复的思辨研究上，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而量化研究则缺乏起码的资源投入。许多课题需要对现实情况进行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和分析，仅仅靠思辨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特别是农村传播具有很多与城市不同的特点，只有大量地占有必需的数据，科学地分析这些数据，才能认识和理解农村传播的特点，提出科学的发展建议。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村传播的研究发展，可能有助于带来传播学量化研究的兴旺。

多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用心竭力最甚的就是方晓红教授。她以新闻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关系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仅在“十五”计划期间，她领导的课题组先后获得了“苏南农村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关系研究”等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和一个省级项目。这些课题研究新闻传播的过程、途径及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农村社会的变革对于新闻传播的能动性及制约性。研究力度、深度及广度在国内这个领域中拔得头筹。

方教授曾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数百名师生，先后进行了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受众调查等多项调查。走访普通农户家庭，与村民、村干部、乡村医生对话、拉家常，最终得出 10 万余个可供有关单位决策参考的基本数据。从苏南、苏北以及城乡的大量数字对比中，得出“城乡之间的差距，软件比硬件差距更

大”，“大众传媒正是架设在城乡心理鸿沟上的桥梁”等结论。这些结论如果仅仅依靠思辨是很难推导出来的，即使推导出来也很难令人信服。

方晓红教授在农村传播研究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是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大众传媒与农村》。作者提出的“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等观点，这些结论来自于量化研究和人文研究的结合，对于农村媒介的发展既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前瞻性。

而现在出版的这本著作，主要着眼于农村传播的研究如何科学地、可持续地进行。这本以学术价值作为其特色的著作，为农村传播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核心要件，即媒介对“三农”作用的指标体系，及其研究路径、原则、作用、测量对象和操作规程等。我国以往的媒介调查多为一时一事的静态考察，延续性、扩张性较差，涉及动态研究、横向研究的调查数量很少。媒介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纵横比较就很困难。方教授曾将自己主持的2000年的江苏农村受众调查与1983年、1985年两次由江苏社会科学院主持的江苏农村居民接触新闻传播状况的调查进行比较，发现三次调查的数据与数据间，直接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为了正确衡量、检测媒介在“三农”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媒介在“三农”发展中的媒介效用最大化，实现媒介调查的规范化、系统化、经常化、有效性，方教授领着课题组就尝试建立一套检测“媒介对‘三农’作用的指标体系”。本书用很多章节阐述这个指标体系的原理和方法，其中一些章节对于我这样的缺乏统计学等学科的专门知识的人，是要费很大功夫才能读懂的。但我对他们这样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完全明白的。这套指标体系是在他们多年调查实践的基础上反复推敲、比较才得以建立的，耗费的心血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对于我国农村传

播学研究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进行提供了可能，其意义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本著作中，除了重点就建构媒介对“三农”作用的指标体系加以论述以外，作者还以《人民日报》为例，分析了我国传媒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后在“三农”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所经历的变迁。此外，还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从“土地维权”看媒介舆论监测水平两个专题，具体展示了媒介在“三农”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及其不足。看得出，这些研究也是下很多功夫才做成的，放在本书中，对本书结构的完整是必要的，对读者也是大有助益的。

孙旭培

2007年7月于武昌喻家山下

目 录

前 言	1
序 言	6

上编 指标体系研究

导论 “三农”问题:中国之痛	2
一、“三农”:立国之本	2
二、“三农”问题:中国之痛	6
第一章 媒介功能之于“三农”	13
一、中国视界中的媒介功能	15
二、媒介功能之于“三农”	23
第二章 指标体系的研究路径、原则、作用及测量对象	37
一、媒介对“三农”作用的指标体系的研究路径	39
二、指标体系建立的作用	42
三、建立指标体系时遵循的基本原则	45
四、指标体系的功能	48
第三章 媒介对“三农”作用的指标体系概述	50
一、有关模型的说明	50

二、指标体系介绍	52
三、指标体系的测量对象及方法	71
第四章 媒介资源拟合指数模型建立及推导	75
一、“拟合指数”模型的研究目的和现实意义	75
二、“拟合指数”模型建立过程中的难点及解决思路	76
第五章 悖指数模型的建立及推导	94
一、悖指数模型的研究目的和现实意义	94
二、悖指数模型建立过程中的研究思路	95
三、悖指数模型的具体应用和分析解释	99
第六章 指标体系中受众阈值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108
一、受众阈值的理论来源	108
二、受众阈值中的满意度和期待值	109
三、满意度与期待值的关系	111
四、分析模型的建构	112
五、评价模型(受众阈值模型)的建构	116
六、关于模型的补充说明	128

下编 媒介涉农报道研究

第七章 信息传递水平之有效信息	134
一、农民与媒介信息传播	134
二、有效信息界定及指标的设定依据	137
三、议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集合信息的效用	142
四、媒介有效信息传播个案研究	157

五、受众信息需求及评价决定媒介信息效用的实现	172
第八章 观念传播水平是衡量媒介对三农作用的重要指标	185
一、重大政策宣传劝服力度	186
二、重大理论探讨报道劝服力度	195
三、小言论的劝服力度	207
第九章 对《人民日报》观念传播中受众适宜度的检测	213
一、考察媒体对农民形象塑造的意义	219
二、媒介农民形象塑造分析	223
三、结论与思考	239
附录一	
我国“对农电视频道”现状概览	244
附录二	
走出电视媒介服务“三农”的困境	268
附录三	
电视“对农频道”评价指标参考	276
后 记	278

指标体系研究

。本式亦以古自，煮另夏半

土出中画数升文等舞鞭既舞新耳斗，岗李裴山澎舞流所黄
湖耀耀，谷数谷器韵部鼓工人又以排骨，蓝囊，斧石，特百的
炎” 伙人因而；谷前韵舞承祖时之表前即文半中由业亦普既
国舞下示阳人世向更，韵之叫景韵“刃亦舞” 明“帝炎”，“黄
。意之本亦韵

亦以皆障讯，会坏业亦韵歴典个一景直一园中，来平于几
韵舞数韵良自照进会并韵更舞代即文搏亦以。本之国立代斗业
成，舞且韵会并相当丁不留韵舞代由人有升讯而。舞袋味舞
泊林，和懿亦田球出昼”。单舞伙醉舞舞舞，叩粟舞下山舞舞
香芬舞”。瓜舞学圈桑舞由，恩舞舞舞舞舞舞”。案当谷文儿
带韵舞舞舞舞，同有韵口人矣舞舞“只一声舞舞舞，平丰舞里
舞舞而矣舞舞” 舞舞。中景舞舞舞亦小韵舞舞，单舞日昔人
。舞舞舞人以舞舞文半中，里舞舞舞舞舞舞自舞舞舞舞五，“华

。尔人人第之舞出舞思本亦而

前韵舞思亦重舞舞，中舞舞舞舞《舞舞》、《舞舞》亦早
亦。人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本亦” 出舞舞舞舞舞。表

导论 “三农”问题：中国之痛

一、“三农”：立国之本

华夏民族，自古以农为本。

黄河流域磁山裴李岗、长江流域河姆渡等文化遗迹中出土的石铲、石斧、磨盘、骨耜以及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存，默默陈列着农业在中华文明萌芽之初所承载的角色；而国人对“炎黄”、“炎帝”即“神农氏”的景仰之情，更向世人昭示了我国的农本之源。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历朝皆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而历代诗人也为我们留下了当时社会的见证：如“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等脍炙人口的诗句，皆能将我们带入昔日简单、淳朴的小农经济场景中。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正是在这种自然经济的摇篮里，中华文明得以久经历练。而农本思想也随之深入人心。

早在《尚书》、《国语》等先秦著作中，便有重农思想的萌芽。最先明确提出“农本”观念的有法家李悝、商鞅等人。在